

新史學思潮對清末民初歷史教育的影響

張 心 愷

一、前 言

「歷史」一詞通常有兩種含義，一方面指的是人類全部的過去；另一方面指的是人類對自己過去的回憶和思考，是一種歷史的認知。歷史教育則是透過「教」一對歷史知識的傳播，與「學」一歷史知識的接納，來建立整個民族的自我瞭解與自我認同。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不只是研究一般人心中有些什麼歷史知識，而是這些歷史知識（內容）怎麼樣被組織起來？被怎樣的歷史思想的架構所吸收？有怎麼樣的價值意義¹？這個過程，往往帶著「現實關懷」與「價值意識」而建立²。當社會環境變遷，價值意識改變，人對歷史的認識也就有另一番不同的解釋脈絡。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而豐富歷史的民族，此一傳統也反映在歷史教育上。早在春秋時代，孔子修《春秋》，打破學在官府，開創私人講學，歷史成為主要的教育內容，它的價值與功用在於提供資治的龜鏡、與道德的勸誡，這也是傳統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自十九世紀以來，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激烈衝擊，過去對於中國歷史的認知，已無法因應新局，發揮自我認同、自我瞭解的功能。然而，人是不能沒有歷史意識的，否則就如失根的浮萍、東飄西蕩，無法為自己在時間之流中定位。中國近代新史學思潮的興起，便是在這樣一個舊價值崩潰之際，知識份子透過歷史的反省與思考，重新詮釋中國歷史，以建立新價值的努力過程。此一歷史意識的抉擇與轉變，也深深影響了中國歷史教育的發展。

過去有關歷史教育的研究，較偏向教材與教法的探討；對於新史學思潮則較傾向於思想層面的研究。畢竟，思考歷史教育的本質，無可避免地必須回歸到歷史的意義與功用。由於新史學並非是一個嚴謹的學派，而是歷史學家反傳統或重

新詮釋傳統的共同趨向，各有其不同的路徑。歷來學者如馮友蘭、周予同將其分爲「泥古」、「疑古」、「考古」、「釋古」，或錢穆將它分爲「傳統派」、「革新派」、「科學派」。本文並不欲深究其源流發展、各派異同，僅以清末揭舉「新史學」大旗的梁啟超，以及五四時期翻譯、引介美國史家魯濱遜 (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 《新史學》的何炳松，還有曾參與教科書編纂工作的顧頡剛爲主要分析人物。希望藉由瞭解近代史學家對歷史的重新反思與建構，以及它反映在歷史教育的變遷過程，一窺近代中國歷史思想的嬗變，以及「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間有機的互動關係。

二、新史學之思想特質

(一)對傳統史學的批判

傳統中國視史學爲資治的龜鏡，治亂的葯石，道德勸誡的利器，「借鑑」與「勸戒」便是傳統歷史教育主要的目標。「借鑑」側重在研究歷代的興衰治亂，「勸戒」則說明人倫道德上的垂訓意義，由此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³。在這種「鑑戒式的歷史思想」下，「歷史」這個概念指的是事例的匯集，讀歷史是認識事例，寫歷史是保存有訓戒意義的事蹟，其中行爲的成敗、得失，對後人有鑑戒的功能⁴。把「歷史」視爲許許多多事件的匯集；各別的事件與事件之間不一定有相互的關聯，所有的事件之間更不構成一個關係緊密、相互抑制或推動的完整過程。匯集這些個別而零散的歷史事件，在傳統史學有兩種最普遍的方式：一爲以年繫事的編年體，一爲以類繫事的紀傳體⁵。表現在歷史教育的教材中同樣是這種精神，以宋朝學子必修的史書《通鑑綱目》爲例，其體例如「匈奴和親」、「諸呂之變」、「南粵稱藩」、「七國之叛」⁶，西漢的幾個現象，沒有橫的關連，也沒有直的聯繫，只是提供戒鑑或典範的事例。

在時代的激烈變遷中，史學事例所含的教訓已對學子失去意義。梁啟超即深深感慨「吾生平有屢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學子叩吾以治國史宜讀何書，輒沉吟久而卒不能對」，他懷疑的是讀了二十四史、通鑑、三通，「其所得者究能幾？…即遍讀之亦不能養吾志而給吾求，則惟有相率於不讀而已。」如果繼續這樣下

去，「恐不及十年而中國史學將完全被驅出於學問圈外。」⁷ 因此舊史學已失去時代的意義與功用，史學的改造是目前最急迫的問題。

早在戊戌政變法之前，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譯書》就提出，中國舊史「所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謂之君史」，西國之史，「所重在一城一鄉教養之所起，謂之民史」⁸，由比較之中，開始意識到中國傳統史學的不足，應廣譯西書取法他人之長。待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期間，更進一步透過日本譯著，吸收西方史學觀念，而後系統性地、全面反省檢討傳統史學之弊。於1901年和1902年發表了震動一時的《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在這兩篇史論中，他以痛快淋漓的筆墨，對兩千多年來的傳統史學作了猛烈而有系統的批判。梁啟超將舊史學的問題歸納為「四弊」、「二病」、「三惡果」。傳統史學最大病根在於「四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緣此四弊，在史學編纂上，復生「二病」：「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其二能因襲不能創作」。以上弊病對讀者造成「三惡果」：一曰難讀，二曰難別擇，三曰無感觸⁹。他對傳統史學批判之氣勢雄偉，鋒芒犀利，無人能出其右。

他痛斥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帝王之家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其中連篇累牘，記載的不外是「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和統治集團間爭權奪利的血腥殘殺，「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至於以人物為歷史之材料，「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誌銘而成者耳！」並指出「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知古不知今，是為陸沉」，而中國汗牛充棟的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毫無理想。同時，在編纂上，舊史大多「陳陳相因」，毫無創新。這樣的史書，只能是以往歷史的呆板記錄，既不能結合實際，究明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優劣得失，以利民生，其上者也不過充當帝王的「政治教科書」，與國家人民的事業毫無關係，更不能顯示群體進化之理，以「鑑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因而，舊史不僅不能成為「益民智」之具，反而成為「耗民智」之具¹⁰。

梁啟超如此毫無顧忌地痛斥傳統史學為「帝王將相家譜」、「相斫書」、「墓誌銘」、「蠟人院」，以上這些對傳統史學的抨擊，當然包含有不少偏見，

不少言過其實的地方。然而的確也直陳出傳統史學的不足，這些論點猶如撼動舊史學的「颶風」、「火山大噴火」、與「大地震」，在當時的確起了發聵震聾、解放思想的作用，梁啟超遂自比為「思想界之陳涉」¹¹，登高一呼、揭竿而起，獲得極大的回響與共鳴，新史學革命於焉浩蕩展開。

(二) 確立新史學宗旨

在猛烈抨擊傳統史學的同時，也提出了一系列建立新史學的主張。這些主張最重要的是提倡為「國民」寫史，這也是一切新史觀的出發點。他之所以特別強調群眾的重要性，實在和他所處的時代有密切的關係，當時正是中國捨棄專制，走向民權的時候，國民群眾的地位漸趨重要¹²。因此史學的目的與功用在於：

今日所需之史，則「國民資治通鑑」或「人類資治通鑑」而已。史家目的，在使國民察知現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活息息相關，而因以增加生活之興味，睹遺產之豐厚，則歡喜而自壯；念先民辛勤未竟之業，則矍然思所以繼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觀其失敗之跡與夫惡果之遞嬗，則知恥知懼，察吾遺傳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矯之也。夫如此，然後能將歷史納入現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連鎖；夫如此，則史之目的，乃為社會一般人而作，非為某權力階級或某智識階級而作，昭昭然也¹³。

這段話，在今天看來仍鏗鏘有力，是歷史功用，也是歷史教育目標的最高理想。史學不再是為帝王統治提供資鑑，也不再是為綱常倫理說教，而是「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及其「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¹⁴，著力於探討整個國家和民族興衰之故，使之成為「國民資鑑」，以激發人們的愛國心，教育團結國民、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簡言之，「歷史者，敘述人群之進化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¹⁵強調歷史以「人群」為中心，以「進化論」貫穿整體，以分析究明歷史發展變化的因果關係「求得其公理公例」。從而達到兩個效果：一為「進步思想」，進化至自由、平等；二為「民族思想」，史學乃愛國心之泉源，其將喚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¹⁶。

其次，在內容上，要求突破傳統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和政治史為主幹的狹隘格局，把記載和研究範圍擴大到智力、產業、工藝、美術、風俗，教育、交通等人類生活各層面，並說明中華民族在人類全體上之位置及其特性。即以文化

史取代政治史。同時，必需改變舊史學偏重古史的積習，把歷史研究的重心轉移到與現實生活聯系更為密切的當代史方面，做到「詳近略遠」，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提供借鑑。最後，在方法上，要求突破傳統史學方法的束縛，充分吸收地理學、地質學、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政治學、宗教學、法律學，經濟學以及倫理學、心理學、物理學、社會學乃至生物、化學等各種現代科學新成果和新方法¹⁷。這些論點在今日看來，不免淺顯且視為理所當然，但這正是「舊史學」與「新史學」的分水嶺，自此歷史學乃趨向嚴密而精緻之學問。

梁啟超對我國新史學雖有啟發與倡導之功，然而數千年來傳統積習，絕非旦夕之間即可摧陷廓清，仍須有人繼起提倡，才能蔚成風氣。而在我國史學界新舊過渡之際，直接受過西洋史學訓練，且首先介紹西洋史學及其方法於國內者，即為何炳松¹⁸。五四運動時期，隨著國內民主、科學思潮的興起，西方各種史學理論也紛至沓來，美國進步派史家魯賓遜的著作《新史學》便在何炳松的翻譯下，引介至國內。透過《新史學》的翻譯，何炳松有系統地介紹了魯賓「新史學」的以下觀點：

- (1)在研究範圍方面，反對傳統史學只注重政治史研究的偏向，認為人類的活動決不僅限於政治一端，舉凡人類全部過去的活動都應包括在新史學的範疇之內。諸如意識的成長、習俗的構成、藝術的進步、自然科學的興起、物質文明的演進，以及諸種經濟、社會、政治團體及制度的變化等等¹⁹。企圖在總體上以進化的觀點，重建人類文明史。
- (2)在研究方法方面，主張借助考古學、地質學、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法律學、倫理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多種現代社會科學知識，作為「史學的新同盟軍」²⁰。在廣博的基礎上，擴充史學觀點。
- (3)至於史學的功用則在於：「歷史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類種種問題的前景。」²¹在當時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影響下，新史學非常強調史學的實用價值。新史學的最後目的就是要將「歷史變為現在有用的東西」²²，研究歷史是為了幫助人們了解現在和推測未來。

令人訝異的是，梁啟超的「新史學」發表於1902年，尚早於1912年魯賓遜在美國出版的《新史學》，兩者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新史學」的口號，且在研究

範圍與研究方法的主張，都不謀而合。惟在史學功用方面，梁是站在民族主義立場，強調歷史得以激發愛國心；魯濱遜則強調史學的致用在於自我瞭解、啓發智慧。這並非巧合，而是時代與史學發展之必然。當工業革命百年之後，社會結構變化，工業人口增加，大眾自覺提高，民主政治推展，國民教育普及，當人人都要讀歷史時，歷史作品必須與「底層活動」，與每個人生活相關²³。到達此一新的認識及歷史新的研究方向，在各國容有過程上的不同，然而從英雄偉人、政治史為主「由上往下看」的歷史，轉變成為以人民群眾、社會經濟文化史為主「由下往上看」的歷史，其趨向是一致的。歷史已不再是帝王的政治教科書，不再是知識份子在學術殿堂探幽索微、坐而論道的材料。歷史學研究的成果，應當成為全體國民的共有財富，歷史教育應當成為國民教育中不可缺的一環²⁴。因此，新史學派的史家莫不對歷史教育，投以相當的關注。

三、史家對歷史教育的新認識

(一)歷史教材設計的新觀點

戊戌變法前，康有為、梁啟超利用書院或學堂推行維新教育，歷史也是其中主要課程，康有為的萬木草堂，就曾設了「萬國政治沿革得失」、「中國政治沿革得失」等課目。由梁啟超擔任中學總教習的湖南時務學堂，諸生除了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還要讀《日本國志》、《萬國史記》、《泰西新史攬要》。梁啟超很注重史學和歷史教學，並且進一步論述了歷史學科的重要性。他在《新史學》中，明確指出：「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有固有者惟史學」。認為史學是「最博大，最切要的學問」，能起到「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泉」的教育作用。他說，西方「民族主義」發達的各國所以能「日漸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中國要提倡民族主義，要使四萬萬同胞強立于世界，本國史學為人人所當從事者²⁵。故藉歷史促進民衆意識之自覺，以激發愛國心，此一民族主義立場為其歷史教育的重要目標。

此外，他對教科書的編纂也十分重視。1922年，他在中華教育改進社歷史教育組會議上提出《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並目錄》。在這篇文章，他指出現行之教科書及教授法，實不能與教育目的相應，其最主要的缺點在於，現行教科書仍

偏向政治史，且注重朝代興亡與戰爭，無法說明政治趨勢之變遷。有關社會文化，雖於每朝代之後間有敘述，然太簡略且不聯貫。學生受國史教育完全不能得明確的印象，對祖國不能發生深厚的情愛。所教授之史蹟與現代生活隔離太遠，學問與生活打成兩橛。這些政治現象充滿機詐黑暗，學生徒增保守性或其他惡德，與民治主義之教育適相背馳。使得學生對歷史不但不發生興趣，且有厭惡的傾向。今為矯正缺點順應時代，提出國史教本改造方案，並附有他所設計的中學國史教本二百課目錄。這個目錄欲以文化史取代政治史，用縱斷史取代橫斷史，將本國史分成：(1)年代(2)地理(3)民族(4)政治(5)社會及經濟(6)文化六大類，為編纂近代歷史教科書規劃了十分詳盡的藍圖²⁶。從目錄看，社會、經濟、與文化份量最重，共一〇一課，占全書一半以上，合乎其以文化史取代政治史的意旨。只可惜梁啟超未曾將這一構想付諸實踐，以其史學之宏偉、史識之精闢、與史才之文采動人，卻未曾撰寫出一部中國通史，實在令人惋惜。

何炳松所引介之魯濱遜《新史學》，也相當重視歷史教育。他強調歷史知識對培養人的「智力」的作用。該書第五章「普通人應該具有的歷史知識」，就是專論這個問題。在談到歷史教育與現代工業之間的關係時，他指出：「歷史這門學問，不但可以使工人得到一個社會進步和社會未來的觀點，並且可對他提供某些事物的背景，使他可以在自己的環境裡把這種知識利用起來，又可以豐富他想像力，把他的思想擴大到工廠以外。」²⁷何炳松在其《歷史研究法·緒論》中闡述道：「歷史最大之用，實在其有培養智慧之功」，「深悉演化陳跡，方有解決之方。」²⁸提出了歷史教育另一項重要的功能，通過歷史知識的教育，可以培養人們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學會透過現象，洞察事物本質的能力，以提高人的智力。此一新史學派重視歷史教育與歷史知識的普及，並充分認識歷史對建設現代化工業國家的關係，致力於將歷史著作寫得內容豐富又明白易曉，使之成為雅俗共賞的讀物。

何炳松即秉持這一理念，投入歷史教學中。他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講授西洋史所編譯的教科書《中古歐洲史》《近世歐洲史》便具體貫徹新史學的觀點。和以往的歷史教科書比較起來，這兩本書更強調對一般歷史文化現象的描述，尤其重視社會經濟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以及科學技術對人類文明的巨大影響。在此之前國內流行的世界史或歐洲史教科書，大多內容粗糙，或從日本轉譯，產生的錯

漏誤解比比皆是。何炳松的這兩部著作是較早直接據歐美史著編成的教科書，內容完整有系統、觀點較新、言語簡練，頗受當時歷史教學界的歡迎²⁹。其後，何氏任上海商務印書館史地部主任多年，並投入中學教科書「外國史」的編纂。這四冊「外國史」雖是中學教科書性質，卻能在有限篇幅內，簡要敘述範圍既廣、材料又豐富的人類文化演進過程，以文化的演進為經，過去的事件為緯。就人類政治、經濟、社會、學術、宗教等活，作客觀地綜合說明，力求符合新史學之準則。不偏失於民族精神，也不專重於大同主義，不流於瑣碎，也不致於空疏，頗能言之有物，綱舉目張。書中搜集適當插圖，繪製地圖年表等，以提高教學效率。尤其難得者，在於其史識，不以歐洲為中心，而將曾亞洲歷史舞台活躍過的匈奴人、安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都放在世界史上³⁰。由此，將新史學的史觀具體落實在教科書的內容中，更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力。

另一位活躍於五四時期的新史學史家顧頡剛，大家都熟悉他是疑古學派的創始人，又是我國民俗學的奠基者。而他在歷史教育方面的觀念，則是較不為人所知的。如同其他新史學家，他的歷史教育觀，也是以「社會進化論」為基礎。他認為歷史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向青年指出社會「進化的跡象」和社會狀態的「椎嬗變遷」，有了這種知識，青年便可明瞭怎樣繼前人而去工作，或循序而進、或改變方向，也可知道對前人的遺產，如何採用和添造³¹。後來他又為文指出，教歷史要有「高尚的目的」、「特殊的使命」，高尚的目的就是使青年知道過去的光榮，肩負起承前啓後的責任；特殊的使命就是以民族精神為中心思想，激發青年的愛國主義之心。同時應用披沙揀金的手段在古代文獻裏把「人」找出來，並把他的社會經濟背景都找出來³²。這些教育功用的觀點，只是追隨先驅者的足跡，並無新意。在歷史教育中他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將疑古學說推廣運用到歷史課本中去，改變舊歷史課本神話傳說的開端。

1922年春，顧頡剛因祖母病重，向北大請假回蘇州老家侍親，經人介紹在家中為商務印書館編纂《中學本國史教科書》。對顧頡剛來說，這並不是一件難事，但他仍用了很多心思，想了許多法子，希望「把這部教科書，做成一部活的歷史，使讀書的人確能認識歷史的整個活動，得到真實的歷史觀和研究興味。」抱著做成「一家著述」的意願，他開始動手編書。首先便碰到上古史怎麼寫的問題，三皇五帝的系統在他當時的腦中已被推翻，於是打算寫一篇「最早的上古史

的傳說」，作為開端。在整理上古傳說史料時，發現一大疑竇，越是後產生的傳說，其年代越是久遠。這在上古研究中是一重大發現，根據此一發現，他提出了「古史為層累造成的，發現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的重要假設。因此他決定在教科書中不提「盤古」，對「三皇五帝」加上「所謂」二字表示並非真實³³。在此以前，舊歷史課本都是以盤古開天闢地為開端，對三皇五帝深信不疑，在當時考古學尚未解開上古史的疑竇之前，此舉無異對傳統的歷史觀點造成嚴重挑戰，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的神聖源頭，引起很大的爭議³⁴。

由以上所述，印証了「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之間有機的互動關係。過去通常認為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差異在於：史學的目的要求真，希望透過史實的重建，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作為將來人類的將來的借鏡。歷史教育大體相仿，但卻更注重史實中含有的教育意義³⁵。亦即一以「求真」為目的，重客觀，一以「求善」為理想，偏主觀。另一種看法認為：歷史研究建立對過去有系統的認識，即歷史知識，歷史教育的工作是傳播歷史研究的結果³⁶。彷彿歷史研究為上游製造工廠，歷史教學為下游銷售管道。事實上，兩者之間並如此簡單地截然劃分，或機械性地單向傳播。就其本質而言，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都是在「求真」的基礎上，拓深人類歷史意識，加強人類時間深度的「人文知識活動」³⁷。

何炳松在「外國史」教科書中，強調亞洲與中國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以此提醒國人在國勢衰微之際，不應妄自菲薄³⁸。顧頡剛在編纂教材的過程中，意識到某種隱藏在史實中的「意義」，因而刺激他研究工作的新取向，以科學求真的精神，帶著明確的問題意識，進入歷史資料之海，建構一個有意義的歷史圖像。如此，從現實的關懷為出發，因教學而刺激研究者的問題意識，由研究成果提出有意義的歷史解釋，成為教學的內容。如此一來一返之中，「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建立並發展出「有機的互動關係」及「詮釋的循環關係」³⁹。

(二)歷史教學方法的新主張

傳統的歷史教學方法，總要求學生記憶大量的史實，梁啟超對於這樣的教法頗不以為然。他談到「國之教人，偏於記性者也。故古地理、古宮室、古訓詁、古名物、纖悉考據，字字有來歷。其課學童也，不因勢以導，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後已。」⁴⁰他並舉例說：「吾昔在友家見一八歲童，其父

面試以元明兩代帝王世次及在位年數，童對客儂數，一無漏訛，倘此童而以他朝同一之事項質客者，客惟有忸怩結舌而已。吾極嘆此童之慧敏，轉念如此慧敏之勞，而復以此等一無價值之勞動，其冤酷乃真無極也。」⁴¹ 因此他非常重視教學方法，提出了多項改革。

首先他強調以「趣味」組織教學。梁啟超最痛恨強制性灌輸的教學方法，認為這樣會使學生「對師長若獄吏之尊」，把學習「視如豚笠之苦」，必然不受學生歡迎，因而他力行趣味性教學，做到「導之以理，撫之以術」⁴²。以此引起學習者的興趣，從而達到教學的目的。其次在講授方面，他推崇其師康有為「海潮獅吼」的講授方式。康有為講學時，「每論一學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⁴³「其講演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盪學者之腦，使之悚息感動，終身不能忘。」⁴⁴ 這種古今中外廣徵博引的講授方法，對學生具有很大的啟發性和強烈的感染力。此外，他認為「凡遇複雜之史績，以表馭之，什九皆可就範也。」⁴⁵ 他平生讀書教書最喜造表，圖表的運用對交待錯綜複雜的歷史過程具有十分顯著的教學效果，也是梁啟超倡導的教學方法之一。

至於何炳松，他除了翻譯《新史學》外，也翻譯了另一新史學派史家亨利·約翰生 (Henry Johnson) 所著之《歷史教學法》，這是我國首見有關歷史教學法的書。書中主張歷史是進化的，反對以歷史作為褒貶或殷鑑的工具，尤其反對歷史教學專事記誦人名、地名與日期等瑣碎事項，而主張應該注重社會經濟史、當代史和科學的歷史⁴⁶。何炳松在自己所著的《歷史教授法》中，也認為「教授歷史應具科學的精神。所謂科學的精神就注重普通人同普通的事。」要求讓學生了解「社會整體的演變，而不是僅僅以知道一些英雄名士的事跡為滿足，同時在方法上切忌死板，應努力使得過去能夠「活現」出來」；如組織學生遊歷古跡，參觀實物，注意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獨立思考能力等，進而逐步引導他們掌握治史的基本方法⁴⁷。

而顧頡剛則以他親身的經驗，對傳統教學法有非常生動深刻的描述，他談到年幼時雖然對《左傳》極有興趣，但卻要從難念的經書開始念起，老師對他非常的嚴厲，「我越怕讀，他越要逼著我讀。我唸不出時，他把戒尺在桌上亂碰，背

不出時，戒尺便在我的頭上亂打。在這種威嚇和迫擊之下，常使我戰慄恐怖，結果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一生永不能在言語中自由發表思想。」⁴⁸ 後來他讀《左傳》時相當能夠理解其涵義，讓老師十分詫異，而誇讚他：「這小孩記性雖不好，悟性卻好。」顧頤剛卻感到「我雖承蒙他獎讚，但已做了他的教育法的犧牲了。」⁴⁹ 由於這種傳統教學方法的弊病，讓他身受其害，所以對教學方法格外重視。

他認為教師素養比教學方法更重要，若教師本身素養不足，懂得教學方法也是沒有用的。所以教師上課必須充份準備，在課堂上補充的材料「貴精審，不貴蕪濫」，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有「深入的眼光和精明的判斷力」，而這等能力又需從博覽和精研中獲得⁵⁰。博覽是指盡可能地閱讀史實與理論的參考資料，精研是指教師能夠提出自己的見解，以進化論的歷史觀來解釋具體的歷史現象。至於怎樣才能引起學生對歷史課的興趣，顧頤剛提出從「激發光榮感」、「引起實用感」、「產生新鮮感」、「從學生的所知入手」等四方面⁵¹。符合了現代教學原理中，注意學生的起點行為，以新鮮有趣的事例、與現實社會相關的問題，由近而遠，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激發學生對過去歷史的光榮感，達到民族主義的情意教學目標。

由於這個階段也正值由傳統村塾、書院，轉化為新式學堂的教育制度，由過去的精英教育擴及為普遍的國民教育。因此這些新史學派的史家，在此新舊過渡之際，莫不共同主張由過去以教師為權威的注入式教學法，改革為以學生為主體的啟發式教學法。尤其是歷史為人文知識活動，絕不再是強迫學生背誦一大堆年代、人名、地名的零碎事項，而是對歷史有通貫性的觀念，瞭解到國家民族與人類社會整體的演變，發揮「通人我」、「貫古今」的功用，培養學生具有「時間感」與「社會感」的歷史意識⁵²。同時，除了關注老師的「教」—教學方法之外，更注意學生的「學」—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如此更能提升教學的品質與成效。

四、清末民初歷教育反映的新史學思想

(一) 清末的歷史教育（光緒二十八年到宣統三年 西元 1902-1911）

二十世紀初，在廢科舉、興學校，開民智的熱潮中，歷史教育曾經大為興盛，蔚為一時風氣，具體顯現出中國近代新史學的趨向與義意。光緒二十八年（西元 1902 年），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式頒布的「壬寅學制」，即所謂「欽定學堂章程」，規定從蒙學院、初等和高等小學、中學堂、高等學堂（包括師範學堂）、分科大學堂、通儒院、進士館都設有歷史課⁵³。這是歷史教育真正有系統地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開始。清政府所提出的教育方針是「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礎。」⁵⁴其各級學堂歷史教學的內容分別為：

- (1) 蒙學院：歷代國號、帝王世系、帝王年數、建元、歷代興亡大事、歷代疆域及分割之情狀，兼授地圖。
- (2) 初等小學：上古三代之大略、秦漢之大略、兩晉南北朝。
- (3) 高等小學：唐五代之大略、宋遼金元、明之大略。
- (4) 中學堂：外國上世、中世、近世史、外國史法制沿革大略。
- (5) 大學館、進士館、師範館：中國典章制度、外國典章制度、中外治亂興衰（師範館並授以教史學之次序方法）⁵⁵。

由教育方針來看，尚未擺脫經史混雜或以經為宗，以史為輔的格局，並十分強調綱常大義與忠孝之本。由教育內容觀之，仍重視對帝王世系、與年代的記憶。雖然中外歷史體系大體完備，但中國史卻只到明朝便嘎然而止，對兩百餘年的清史隻字未提。誠如梁啟超批評舊史之「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或許是因為中國史學中後代為前代修史的傳統，故「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的原故⁵⁶。此外，此時開始重視外國史的教學，顯示滿清政府在一連串國難之後，也願意開眼看世界了。欽定學堂章程雖在頒布未久，即行廢止，但它在教育上仍為我國正式學制之濫觴，也是歷史教育較有規劃與設計之始。

光緒二十九年（西元 1903 年），清廷又公布「癸卯學制」，是謂「奏定學

堂章程」，進一步明定了各級歷史課程的教育要義。各級學校其歷史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分別為：

- (1)初等小學堂的教學要義在：「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尤當先講鄉土史，採境內鄉賢名宦流寓諸名人之事跡，令人敬仰歎慕，增長志氣者為之解說以重其希賢慕善之心。」⁵⁷ 其教學內容為：鄉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實。歷朝年代、國號、聖主賢君、本朝開國大略及列聖仁政⁵⁸。
- (2)高等小學堂的教學要義為：「陳述黃帝堯舜以來歷朝治亂興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變遷，鄰國日多、新器日廣；尤宜多講本朝仁政，俾知列聖德澤之深厚，以養成國民自強之志氣，忠愛之性情。」⁵⁹ 其教學內容為中國歷史之大要。
- (3)中學堂的歷史教學內容與目標更加明確周詳：「先講中國史，當專舉歷代帝王之大事，陳述本朝列聖之善政德澤，暨中國百年之大事；次則講古今忠良賢哲之事跡，以及學術、技藝之隆替，武備之弛張，政治之沿革，農、工、商業之進境，風俗之變遷等事。次講亞洲各國史…；次講歐洲、美洲史，詳於大國而略於小國，詳於近代而略於遠年。五十年以內之事尤宜加詳，並示以今日西方東侵東方諸國之危局。凡教歷史者，注意在發明實事之關係，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⁶⁰
- (4)至於培養歷史專業人才的大學堂，其研究內容則舉凡歷代國政、人民性質、物產盛衰、都會建制、人文學術、民間習俗、兵力強弱、選舉得失等幾乎無所不包。史學研究專為鑒古知今有裨實用而言，與貫通古今大勢的通鑑學近，精於一朝的正史學與此縱橫各異，故正史學與通鑑學有相資補助之處。此外，以人類學、公益學、教育學、金石文字學、古生物學（即考古學）、全國人民財用學、國家財政學、法律原理學。為隨意科（即選修科目）⁶¹。

由此可見，「奏定學堂章程」所制定的歷史教育目標，雖然仍非常強調聖主

賢君、歷朝治亂興衰，但比較上已吸取了新史學的許多觀點。在中小學教育中，除了政治史的沿革外，還擴展至農、工、商業與風俗之變遷。並根據不同年紀與心智發展，由近而遠地從鄉土史而本朝史、本國史、亞洲史、歐美史。並指出詳近略遠的原則，從現實關懷出發，注重事實之因果關係，闡明文化由來與盛衰興亡，以激發國民之愛國心與自強之志氣。如新史學之史家所希望以民族精神為歷史中心，使歷史教育發揮「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泉源」的作用。而在大學教育中，則強調通史與斷代史的相互為用，與史學鑑古知今的實用性質。研究內容幾乎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層面，且特別重視文化因素與經濟因素，並以人類學、財政學、法律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為研究輔助。新史學所主張之歷史之功用、歷史研究範圍、歷史研究方法皆逐步具體顯現在國家教育章程之中。

(二)民初之歷史教育（民國元年到民國十八年 西元 1912-1929）

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二百多年的滿清，而且推翻了四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實為中國有史以來的一個大創局。從此以後，凡從前因緣君主專制制度而存在的典章和思想，均受根本打擊，雖然多數人民對於共和民主政治還未能如法運用，但共和國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呈現一片新氣象。民國成立後，教育制度亦隨之改革，民國元年九月，教育部公布新學制，是為「壬子學制」。此時，初等小學未設歷史課，高等小學與中學才有歷史課，十二月又公布各級學校教則及課程表。

其中，「小學校教則」第五條：本國歷史要旨，在使兒童知國體之大要，兼養成國民之志操。本國歷史宜略授黃帝開國之功績，歷代偉人之言行，亞東文化之淵源，民國之建設，與近百年來中外之關係。教授本國歷史宜用圖畫、標本、地圖等物，使兒童想見當時之實況，尤宜與修身所授事項聯絡⁶²。「中學校令施行規則」第五條：歷史要旨在使知歷史重要事跡、明於民族之進化、社會之變遷、邦國之盛衰、尤宜注意於政體之沿革與民國建立之本。……本國史授以歷代政治文化遞演之現象與重要事跡，外國史授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著名各國之興亡、人文之發達，及與本國有關係之事跡⁶³。

民國建立後，興起一股平民主義的教育思潮，認為教育當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亦即從受教者本體著想，注重個性，立於兒童之地位而體驗之。由於世界平民主義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杜威 (John Dewey) 來華演講，影響更為擴大。他主張民治主義的教育須有兩大條件：一為養成智能的個性 (Intellectual individ-

uality)；二為養成共同活動的觀念和習慣 (Co-operation in activity)。「智能的個性」就是獨立思想，獨立觀察，獨立判斷的能力，對於一切制度習俗都能存一個疑問的態度，不要把耳朵當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裏糊塗認作自己的思想。「共同活動」就是對於社會事業和群眾關係的興趣⁶⁴。這一思潮隨著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科學」、「民主」的呼聲，流風更盛。影響所及，全國教育聯合會以為「施教育者不應特定一種宗旨或主義，以束縛受教育者。」⁶⁵因此，民國十一年全國教育聯合會提出學制改革草案，十一月由政府公布，是為「壬戌學制」。對於各科僅簡單地設定畢業標準：小學為「學習過簡單之本國史地」，中學為「(一)具有較充份之史地常識，俾於社會生活有明確之認識者。(二)能進為有系統研究之基礎者。」⁶⁶

在大學教育方面，各大學紛紛普遍設立史學系，確立起歷史為獨立科系的地位，其課程設置也日趨系統化。一九二〇年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對課程作了進一步改革，一面積極輸入歐美現代史學理論和方法，一面強調「以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為史學基本知識，列於必修科……使學生一改其研究史學之心理，不致專以多識史事為史學。」⁶⁷意味著史學研究範圍的擴大與內容的深入。

由這一發展，可看出新史學的理想更加深切地體現在教育目標之中，明確由過去偏於歷代帝王大事，歷朝治亂興衰，改為注重民族、社會、文化之進化，呼應了新史學所強調「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尤其在中學更重視整體史的歷史教育。在小學則具體提到教學方法，宜用圖畫、地圖、標本，以活潑有趣的方式，引發兒童的興趣，激發歷史想像力，使歷史活現出來。而平民主義教育思潮正與何柄松所引介之「新史學」一樣，同為美國進步主義與實用主義之下的產物，強調教育與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繫。主張歷史的功用在於自我瞭解、啟發知慧，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建立在群體之中團結合作的精神。因此，這一階段中小學的歷史教育，主要注重開闊了學生的知識領域，鍛鍊記憶力和思維推理能力，並涵養愛國心和道德情操。透過歷史教育，以達到「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此外，在培養歷史研究專業人才的大學教育中，更進一步將各社會科學列為必修科目，真正確立以社會科學為史學研究的同盟軍。

然而，由於國家的分裂不安、帝國主義的侵略日劇，過於著重發展個性的平

民主主義教育不足以救中國，故國家主義的教育思潮漸次取代平民主義，以教育建設救國、教育國家化的要求日益提升。民國十五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即依據國家主義，明定教育以養成愛國國民為宗旨，其要點第一條開宗明義為：「注意本國文化，以發揮民族精神」⁶⁸。這正是歷史教育的重要價值與功用。到了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統一中國後，各項政治設施均有刷新，教育方面尤多建樹。當時教育部約集專家一百餘人，組織「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分別起草中學及小學各科課程準，稱為「暫行標準」。此次頒行的「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為我國中小學正式訂頒課程之始⁶⁹。至二十一年研究修定為正式標準，大體不離其精神與範疇。茲以民國十八年所頒定的高中歷史學科本國史的教育目標為例：

- (1)陳述本國民族的分合、政治制度沿變、民生經濟利病，以說明今日中國民族形成的由來與各種政治社會問題發生的源流，而闡發三民主義之歷史的根源。
- (2)注意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之經過，及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的變遷，以說明中國革命發生的背景，指示今後中國民族應有之努力，並喚起學生奮發精進的精神。
- (3)闡明中國學術文化演進的經過，昭示先哲堅卓的工夫與偉大的造詣，以引起學生珍愛本國文化，與繼承先業發揚光大的精神。
- (4)注重近代史，於古史中亦注意其有影響於現今政教潮流者。由歷史事實的啓示，研討政治社會改革的途徑，務使歷史事實與現代問題發生密切的關係。
- (5)指示歷史研究方法；養成「無徵不信」的態度，隨時提出歷史上未解決或可疑的問題，討論其真偽或其影響，以培養學生自由研究的習慣⁷⁰。

此一教育目標非常強調歷史與時代的結合，並具認知與情意，知識與人格涵養的功能，更清楚具體地顯現出新史學所強調與主張的精神和特色。蓋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與時代變遷有極為密切的互動關係。從注重個性的平民主義教育到強調群體的國家主義的教育，似乎有所衝突，實際上兩者並非如此捍格不入。當代史學家錢穆先生便認為，民族精神教育建立於史學知識的了解與體認之中，只要

能正確的認識歷史的演變，自能培養出對國家民族與時代的關懷⁷¹。的確，就歷史教育而言，對國家民族的歷史是「知之切、則愛之深」，情感的認同是建立在「真實」的認知基礎上。故歷史知識的傳授，既可培養受教者獨立的人格，理性分析思考的能力，更可使其對國家民族歷史文化遺產產生一份溫情與敬意⁷²。因此，歷教育實具有人文教育與民族精神教育的雙重功能，這也是新史學思潮所極力想達成的理想，透過歷史教育，啓發國民的自覺，奮力自強以挽救國家於危亡。

五、結 語

中國近代新史學不僅對傳統史學造成極大的衝擊，而且對清末民初以來的歷史教育帶來深遠的影響。傳統史學與史觀已無法對時代的危機與困境提供義意，史學喪失其集體認同、自我瞭解的功用，若不以新的眼光重新詮釋、理解歷史，中國這項最引以為傲的悠久傳統將岌岌可危。梁啟超在時代環境的刺激下，致力於新史學革命，在批判舊史學的破壞之後，繼之提出新史學的要旨以為建設。主張必須建設史學為國民資鑑，以社會群體為中心，將史學範圍由政治史擴展到社會、經濟、文化各層面，並借社會科學為輔助。此一史觀乃為當代世界歷史發展的共同趨向，以因應工業化經濟發展後，大眾社會、民主時代的來臨。

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彼此之間，存在著「有機互動」與「循環詮釋」的密切關係，當歷史研究的觀念更新後，當然也衝擊了歷史教育；時代環境對歷史教育的新需求也刺激了歷史研究的新課題。因此，新史學史家莫不對歷史教育投以高度的關注，也從投入歷史教育工作中獲得新觀念的啓發。就史家的歷史教育思想而言，梁啟超強調歷史教育的功用在於激發愛國心，提振民族精神。何炳松則偏向自我瞭解、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兩者實為歷史教育的一體兩面，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一端。史家或提出大綱、或親身參與中學歷史教科書編纂，將新史學的觀念藉此普遍傳佈。除此之外，有新的教學內容也必須配合以新的教育方法。各個史家大體皆強調，改革過去偏重記憶的注入式教學法，代之以重視理解、分析、應用、綜合的啓發式教育，使歷史成為一門對生活有用的學問。

這些理想在他們的努力下，逐步獲得具體落實，並反映在國家的歷史教育政

策之中。清末庚子後「新政」所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仍十足帶有傳統歷史教育的色彩。一年之隔所頒行的「奏定學堂章程」，便有大幅度的更新，開始有新史學擴大史學範圍至文化風俗的觀念。至民國成立後，隨著民主、共和時代的來臨，新史學史觀更能符合時代的需求。不論是「壬子學制」的「小學教則」「中學校令」，或「壬戌學制」的「改革草案」，以至於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後的「課程標準」，皆體現出新史學的歷史教育思想。其間，容或出現平民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消長，但兩者之間正需要藉由歷史教育的雙重功能取得平衡。總之，由新史學思潮，可看出中國近代思想嬗變之一端；由歷史教育的發展則顯現出新史學思潮由理想而逐步實現的過程，使史學再度發揮時代的價值與意義，其影響也需要今日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的同仁繼續努力延續與發揚。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蘭雅國中教師）

註 釋

- 1 胡昌智〈歷史教育的任務——『中學歷史教育』研討會的迴響〉，收於《思與言》雜誌社編，《史學與社會科學論集》，台北，明文書局，民72年8月出版，頁279。
- 2 黃俊傑〈論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之關係〉，收於《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民81年6月15日出版，頁141。
- 3 林曉平〈說史學上的“借鑒”與“勸戒”〉，《史學史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1993年第1期，頁77。
- 4 胡昌智〈由鑑戒式到演化式的歷史思想——一個中國近代史學結構變遷的初步觀察〉，《東海大學歷史學報》，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民75年12月，頁2。
- 5 同前註，頁2-3。
- 6 李弘祺〈傳統中國的歷史教育〉，《史學評論》第11期，民75年元月，頁14。
- 7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民83年12月30日，頁74。
- 8 梁啟超〈變法通義。論譯書〉，《飲冰室文集》第一冊，台北，中華書局，民49年3月，頁70。
- 9 梁啟超〈新史學〉，收於《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民83年12月30日初及，頁4-9。
- 10 同前註。
- 11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民69

年3月初版，頁394-395。

- 12 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收於《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頁434。
- 13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47。
- 14 同註9，頁5。
- 15 同註9，頁13。
- 16 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收於《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頁956-957。
- 17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第三冊，頁1。
- 18 何炳松(1890-1946)，於1912年公費派赴美國留學，進入當時美國新史學運動的重鎮--威斯康辛大學，學習史學及政治學。後於普林斯頓大學專攻現代史及國際政治，取得碩士學位。
- 19 J. 魯濱遜著，何炳松譯《新史學》，台北，學人月刊雜誌社，民60年1月初版，頁1。
- 20 同前註，頁73。
- 21 同前註，頁135。
- 22 同前註，頁1。
- 23 胡昌智〈對於史學研究中價值問題的若干思考〉，《史學評論》第四期，民71年7月，頁162-163。
- 24 張廣智〈近代以來西方史學反省的歷史考察〉，收於《西方史學散論》，台北，淑馨，民84年，頁22。
- 25 同註9，頁3。
- 26 梁啟超〈中國國史教本改造案並目錄〉，《飲冰室文集》第十三冊，頁26。
- 27 同註19，頁142。
- 28 何炳松《歷史研究法·緒論》，轉引自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0年6月初版，頁345。
- 29 胡逢祥〈何炳松與魯濱遜的"新史學"〉，《史學史研究》1987年第五期，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頁83。
- 30 劉德美〈何炳松與新史學的提倡〉，《教學與研究》第四期，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民71年6月，頁196。
- 31 金相成、朱志明、劉善齡〈顧頡剛早期歷史教育思想和方法初探〉，《歷史教學問題》雙月刊，1985年第二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頁29。
- 32 同前註，頁29。
- 33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頁7-8。
- 34 當時顧頡剛遭到山東省參議員彈劾「非聖無法」，要求加以查禁。戴季陶則說「沒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國人民團結一體的要求解散了，這還得了！」「學者們隨意討論是許

可的，至於書店出版教科書，大量發行，那就是犯罪，應該嚴辦。」而以教科書印發一百六十萬部為理由，判商務印書館罰款一百六十萬元。最後，經說情免去罰款，但書仍禁止發行。顧頡剛日後回憶，稱此事件為“中華民國”第一次文字獄。見註32，頁30。

- 35 李國祁〈史學與歷史教育〉《史學與社會科學論集》，台北，明文書局，民72年8月初版，頁207-208。
- 36 同註1，頁279。
- 37 同註2，頁144。
- 38 同註31，頁196。
- 39 同註2，頁151。
- 40 梁啟超〈論法通議。論幼學〉，收於《飲冰室文集》第一集，頁47。
- 41 同註7，頁48。
- 42 梁啟超〈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飲冰室文集》第十三集，頁12。
- 43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飲冰室文集》第三集，頁62。
- 44 同前註，頁64。
- 45 同註7，頁208。
- 46 劉德美〈何炳松與新史學的提倡〉，頁192。
- 47 胡達祥〈“五四”時期的歷史教學改革述評〉《歷史教學問題》1994年第3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頁30。
- 48 同註34。
- 49 同前註。
- 50 同註32，頁31。
- 51 同前註。
- 52 黃俊傑〈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的境界〉，收於《史學與社會科學論集》，頁210。
- 53 胡達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0年6月，頁258。
- 54 同前註。
- 55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頁238-239、243、252、266、271-283。
- 56 同註7，頁5-6。
- 57 同註7，頁295。
- 58 同前註，頁297。
- 59 同前註，頁310。
- 60 同前註，頁321。
- 61 同前註，頁350-351。

- 62 朱有識《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0年6月，頁119。
- 63 同前註，頁353。
- 64 陳啓天《近代中國教育史》，台北，中華書局，民58年10月出版，頁209。
- 65 同前註，頁217。
- 66 同註56，頁1010-1011。
- 67 同註47，頁29。
- 68 同註64，頁218。
- 69 教育部年鑑編纂委員會《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台北，正中書局，民74年12月初版，頁455。
- 70 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中小學人文學科教育目標研究報告》，台北，三民書局，民76年10月，頁194-195。
- 71 轉引自前註，頁175。
- 72 同前註，頁176。